

许多人不知道,端午节一度被定为“诗人节”。那是在抗日烽火中,山东蓬莱籍诗人臧云远与会聚在重庆的一些诗人,倡议把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端午节定为“诗人节”,以此来召唤人们团结起来共御外侮,振奋抗日军民的信心和士气。臧云远积极参加纪念活动,撰写了大量纪念诗文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# 蓬莱籍诗人臧云远与『诗人节』由来



□郑学富

## 参与起草《诗人节缘起》

臧云远于1913年1月出生于山东蓬莱城里一个书香世家,自幼受到良好教育,在家乡中学毕业后去北平求学。1932年,臧云远在北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开始了革命的文艺生涯。1933年春,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,臧云远前往武汉,与蓬莱同乡杨朔等人创办大型文艺综合刊物《自由中国》。1938年秋,臧云远参加华北救国会的前线慰问团。1939年秋,他在重庆加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(简称“文协”),从事诗歌创作及文化统战工作。当时,臧云远与臧克家并称“山东二臧”。

1940年6月10日端午节晚上,“文协”70多名会员举办“纪念屈原晚会”,臧云远作报告后,几位会员朗诵诗歌,这时有人提议把端午节定为中国的“诗人节”,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。与会人员纷纷发言,相互补充意见,最后达成共识:决定每年端午节为“诗人节”,用“文协”的名义向全国推广宣传,待下一年端午节举行第一届诗人节纪念活动。

1941年端午节前,为办好第一届诗人节纪念活动,“文协”组织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。老舍在《第一届诗人节》一文中回忆:“柳倩、安娥、云远、方殷,还有几位,就征求纪念文字,并与各报纸接洽出特刊。”

臧云远等人起草了《诗人节缘起》一文,经郭沫若修正后,在端午节之前印刷出来,向社会各界广泛散发。这篇文章全文800多字,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屈原,提炼出了屈原精神。文中把纪念屈原与当前抗战联系在一起,以诗人的文采和激情,号召人们弘扬屈原的爱国精神,投身到反对侵略的抗战中去,“我们决定诗人节,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,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……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,诅咒侵略,讴歌创造,赞扬真理。中华民族新生的朝气在飘扬,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在飞扬,中国新的诗艺术的光芒,将永远在宇宙中辐射。”

《诗人节缘起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,各界人士热烈响应,纷纷拿起笔来撰写诗文。为营造纪念诗人节的舆论氛围,《新华日报》于1941年5月30日开辟专版,“编者的话”说:“今日为旧习相传屈原的忌辰,又为第一个诗人节,本报今日所登有关诗人节的各作家稿件,全系‘诗人节筹备会’所供给,盛意可感。特此附告。”专版发表了郭沫若《蒲剑·龙船·鲤帜》、柳倩《纪念与任务——

祝贺第一个诗人节》、和山《关于离骚》、李石锋《从“咚咚……”说到屈原》、七律《吊屈原》和《诗人节的缘起》。

1941年5月30日晚7时,“文协”举行晚会,庆祝第一届诗人节。驻重庆的各大报纸都对第一届诗人节作了浓墨重彩的宣传。

## 诗人节激发创作热潮

诗人节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为切入点,进行抗战动员,成为联合文艺界、鼓舞抗日斗志的凝聚点和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。自1941年至抗战胜利之前,每届诗人节都举行纪念活动和颇有规模的诗歌朗诵会,形成了制度化。一时间,凭吊、纪念屈原的诗词和文章创作蔚然成风,以屈原为主人公的小说、戏剧、论文、随笔数量激增。

诗人节还激发了以抗战为题材的创作热潮。1939年,剧作家陈定在《群众周刊》上看到了关于日军夫妻自杀的报道文章,随即以此作为素材,写成了剧本《官毅与秋子》,后经臧云远、李嘉作词,黄源洛作曲,最终于1941年完成抗战题材歌剧《秋子》的创作。《秋子》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时,周恩来、叶剑英等到场观看,并给予鼓励。由臧云远编剧、王云阶作曲、吴晓邦导演的大型歌舞活报剧《法西斯的丧钟响了》,戏排好后,在重庆“抗战堂”公演,一次就卖掉了两天的票。

1943年6月7日晚,第三届诗人节纪念晚会召开。臧云远在《国讯旬刊》第337期发表文章《迎接第三个诗人节》,文中说:“纪念屈原,学习屈原,把屈原的纪念日当作诗人节,是中国诗人的光荣,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……”

## 撰文感怀第六个诗人节

1946年端午节前夕,反对内战及争取和平、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在全国各地响起。6月4日,迎来了第六届诗人节。当天晚上8时,重庆“文协”和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举办了第六届诗人节茶会。《新华日报》报道说,沙汀、艾芜、靳以等100余人参加。臧克家主持,指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沉闷、艰苦、激动与希望,这正是反映了中国人民八年来的现实生活,并着重指出诗人是属于人民群众的“歌手”。会上还先后报告了八年来的诗歌运动、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,一致提出今后的诗歌道路只有大众化,深入人民生活,与现实相结合,使其成为人民自己的东西,要使诗歌广泛地深入到人民生活中去,同时从人民群众中生长出无数的诗歌工作者。会上还朗诵了艾青的《吴满有》、禾波的《欢迎普遍的民主运动》等诗作。

1946年6月4日的《新华日报》发表了臧云远的《第六个诗人节》。文中回顾了六年以来诗人节的纪念活动,“这六年的日子,走过了不短也不长的路子,路上是充满了血和泪、欢乐和痛苦的,而欢乐不在山城。”他质问:“是谁在制造民族的灾难?”他“仿佛看到了我们的朋友,在上海,在北平,今天也在过诗人节吧”,最后写道:“山城也并不是寂寞的,还像往年一般,江面已经划起了龙船,这恐怕是我们在山城最后一次过自己的节日,我们是多么盼望着四万万同胞过太平的日子,我们也好好地过一次自己的节日呢。”

过完诗人节后,臧云远回到青岛,整理旧有诗稿,开写长篇小说,与岛上文坛名人来来往往。1949年冬,臧云远在北京出席新中国第一届文代会。他先后担任过济南华东大学教授、艺术系主任,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兼艺术系主任,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。1991年盛夏,臧云远病逝于南京。

(本文作者为枣庄市政协文史馆官员、枣庄市首批社科智库专家)

# 青未了·人文齐鲁 A11

□戴永夏

端午是我国民间三大传统节日之一,历来很受人们重视。因为时值盛夏,毒虫孳生,在过去医疗水平低下的年代,常常疾病蔓延,瘟疫流行,所以端午节的许多习俗都与驱瘟防疫有关。

过去每到端午节这天,家家一早就将艾枝插在门上,意在御鬼邪于大门之外;或用艾蒿编成人形、虎形(编成虎形的谓之“艾虎”),挂在门楣中央或戴在身上,以禳毒气、除瘟病。还有的地方,端午这天男女头上都戴艾叶,据说这样也可以驱瘟辟邪。这些习俗历史久远,南北朝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就记载说:“以艾为虎形,或剪彩为小虎,帖以艾叶,内人争相戴之。”明代学者彭大翼撰《山堂肆考》载:“端午以艾为虎形,或剪彩为虎,粘艾叶以戴之。”

在蓬莱、长岛等地,端午节有张贴剪纸的习俗,在一扇门上贴艾虎,另一扇门上贴葫芦,叫做“贴艾虎”。济南则是将“五毒”形象的剪纸做成门符贴在门上,用以驱“五毒”,防瘟疫。

除了插艾蒿以外,在胶东地区,还会加插桃枝,用以驱邪。

菖蒲、艾蒿、雄黄都是中药材,过去在端午节这天,人们都要饮用这三种药材泡的酒,以驱瘟防病。有的还将菖蒲雄黄酒抹在小孩的面颊、耳鼻、手心、足心等处,以防毒物侵害。清代诗人蔡云在《雄黄酒》一诗中形象地写道:“称锤粽子满盘堆,好侑雄黄入酒杯。余沥尚堪祛五毒,乱涂儿额喂墙隈。”还有的口含菖蒲雄黄酒喷洒在床帐间,墙壁上及隐蔽处,边喷边念叨:“雄黄烧酒喷上来,蛇虫百脚(蜈蚣)快跑开。”

许多地方在端午节这天给孩子戴香包,在孩子手腕上系五彩丝线。香包是用棉织品和丝线绣成的,内装雄黄、苍术等中药、香草,戴在身上可驱瘟疫。系五彩丝,常被用来驱恶辟邪。这种彩色丝缕一

直戴在手腕上,要到“六月六”才剪下来,丢进沟里,让水将“病魔”冲走。此俗远在汉代就已经出现,东汉应劭的《风俗通》载:“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系臂,名长命缕,一名续命缕,一名辟兵缢,一名五色缕,一名朱索。”

在鲁南等地,端午节孩子们会戴“五毒兜”,手腕、脚腕系五色“禄寿线”。

端午节绘贴五毒图,可以辟毒虫之害。五毒图是以蝎子、蜈蚣、蟾蜍、壁虎、毒蛇五种毒虫的形状绘制的图案。用五毒图辟毒有多种方式,有的将“五毒”绘制在“辟瘟扇”上,相互赠送。有的将五毒图绣在香包上,在身上佩戴。还有的在端午节这天穿五毒衣。如明代宦官史家刘若愚的《酌中志》记载,自五月初一至十三,宫内太监、官女都穿着绣有五毒虫图案的五毒衣和艾虎褂子。儿童也在端午节这天穿五毒衣或五毒背心、五毒鞋等,以辟邪、免灾、祛病、除害。

蛤蟆墨是用癞蛤蟆加墨制成的药物。过去每到端午这天,早晨天亮之前,许多人都跑到田野水塘边捕捉癞蛤蟆(蟾蜍)。将捉到的癞蛤蟆带回家,将墨锭从蛤蟆嘴里塞进肚子里,待蛤蟆憋死后,再放在中午的太阳下暴晒。晒干后的蛤蟆即为蛤蟆墨,据说可治多种疾病。当皮肤红肿发炎时,将蛤蟆墨用唾沫稀释敷于患处,可消炎解毒,所以过去民间常把它当消炎膏使用。

旧时过端午节,还有挂葫芦的习俗。每到这天,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悬挂纸葫芦,以禳毒防病。纸葫芦是用各色彩纸折叠而成,葫芦下面缀有纸穗,显得十分精巧美观。端午节将纸葫芦挂出来,除了辟邪,也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。山东德州一带就有挂纸葫芦的习俗。

在胶东地区,端午节当天,人们还会用露水擦脸,尤其会擦眼睛和耳朵,有明目之说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)



投稿邮箱: qlwbrwqilu@163.com